

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多维阐释

孙冲亚¹,高福进²

(1.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将掌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视为重要任务,注重通过开展红色仪式来形塑和提升自身形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精神和革命基因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红色仪式是兼具权力技术和意义体系的文化象征范畴,能够在塑造政党形象中提供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路径依循。在红色仪式体系中,红色象征系统构成叙述党的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能够生动地勾勒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者形象;红色语言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形象的言说系统,能够通过“文本图式”和“操演图式”深描党的精神风貌;红色景观为受众预设了一个神圣的功能性场域,能够促使参与主体和仪式主题形成共鸣,进而产生一种持续增强的认同感。新时代铭刻和厚植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是激励全社会成员形成强大内聚力的重要方式,亦是稳固执政根基、提升执政效能的必要之举。要在优化红色仪式中掌握党的形象建设的领导权,包括加强红色仪式的规范化供给,构设契合数字时代特点的价值传播方式;创新红色仪式政治叙事的呈现方式,引导群众对党形成更具黏合力的政治情感;强化红色仪式对外传播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建设,更加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仪式;百年大党;政党形象;政治情感;政治认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将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作为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在现代政党建设进程中,形象塑造与传播是加强自身建设的关键路径,其在强化政党执政能力、凝聚社会认同、提升动员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承载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和红色信仰的政治行为,红色仪式能够通过生产和运用红色象征及操演行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形象、时代形象和世界形象。红色仪式凝结着广大群众对党的政治情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的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大党形象的必然选择。

一、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形象是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生成的无形资源和软实力,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红色仪式具有高度耦合性。红色仪式植根于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和政治权力再生产的过程,通过创造红色仪式元素、规范仪式程序、渲染神圣庄严现场氛围,生动复刻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群体画像。

1. 红色象征:塑造百年大党形象的隐喻载体

“象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叙事方式,政治主体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

引用本文:孙冲亚,高福进.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多维阐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1):2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240);202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25GXSZ016YB)

作者简介:孙冲亚(1993—),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研究。E-mail:sunchiya@163.com

会操控象征范畴。人类的“经验世界”由多样的象征系统构成,当人为地将其划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时,也就从根本上确证了政治主体的所有行为都具有象征性。“象征是真实的政治,以一种特殊的、往往是最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1]6} 政治主体为了有效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必须创造出具有特定政治意图的象征和符号,并将自身同某种隐义的象征发生关联。究其实质,象征源自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具化倾向,能够通过听觉、视觉符号调动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进言之,象征作为一种直接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威性资源,不仅会渗进社会政治生活内部、塑造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还能通过强烈的感染力培养人们对政党的认知和情感。基于此,能否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红色象征及其表征的意涵,是利用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关键所在。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就创造了大量红色象征,生动地塑造出一个“实行社会革命”“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的政党形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3] 政党形象是抽象无形的,只有被象征化和具象化才能为人们所认知。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就注重将红色象征运用于革命实践。所谓“红色象征”,是指称那些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和规范性的红色元素,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实践中被建构出来,并由红色基因、理想信念和精神风范共同规定。“红色”元素作为一种承载无产阶级属性的政治象征,被广泛运用在革命场景之中。如,1928年5月,党中央在军事通告中明确提出打造一支“红军”的指示,强调“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4]218}“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4]221}

红色象征是凝结革命政党性质、宗旨和使命的具象化载体,同中国共产党努力塑造的“革命-救国”者形象密不可分。红色是蕴含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象征符号,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内化为人们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图式,并将无产阶级的形象排除在民众的认知场之外。大卫·科泽指出:“生动的象征可以让人们对

仪式更加难以忘怀,仪式的效果也更加持久,同时仪式中产生的情感刺激也会集中于这些象征之上,并使得人们对仪式表达出的意义更加深信不疑。”^{[1]102} 红色仪式广泛使用的“红色”象征,对党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力。究其根源,“红色”映射出无产阶级炽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其内在的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具有强烈的革命指向。正因如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将“红色”作为自身形象的象征物,这不仅满足了应对国民党“污名化”的需要,还能在扩大宣传和争取民众信任的同时,增强革命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 红色语言:塑造百年大党形象的叙事工具

政治语言作为一种思想性的象征类型,有助于政党按照特定意图刻画自身形象。政治语言之所以是政治权力的外在表现,是因为一切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即“它是用语言表述亦是用语言来指令、传播的”^[5]。政治语言具有一种认知性的信息沟通功能,其在被建构之初就得到了政治系统的支持,并获得了“理性的权力”和“象征的权力”。其中,“理性的权力”指涉政治语言的能指性与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和确定性。政党通过创造一些具有明确意涵的认知性符号,使民众相信本党在根本利益上会和他们保持一致,由此塑造一个代表“众意”的政党形象。“象征的权力”是指当政治语言的指涉范围超过了其“能指”性范畴时,政治主体便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建构它与原有意义之间的联系。当政治语言的这种权力被用于表达情感和价值时,民众将会以情感化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而政党也将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赞同。

“红色语言”作为政治语言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样态,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形象的言说系统。红色语言分为“文本图式”和“操演图式”两种类型:文本图式类的红色语言又可称为红色文本,是记录红色历史、赓续红色精神的红色语言载体。红色文本可以是书面化的表达形式,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革命领袖文稿、党的重要文献,也可以是覆盖党、政、军、群系统的红色刊物、漫画、标语、诗歌和音乐等。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很

早就认识到红色文本在塑造红色形象上的作用,并在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红色刊物。如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明确指出,要使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6],以及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区域的报刊宣传体系。红色报刊是一种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叙事媒介,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红色形象的重要堡垒。事实表明,红色报刊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7],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妖魔化”革命群体的舆论导向。

操演图式类的红色语言是指仪式参与者的身体语言,也被称为“体化实践”。该类语言承担着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意义和结构,可以帮助参与主体自觉地剥离其异质性的社会群体身份,促使个人意识在仪式操演中不断分化与整合,最终内化成为所有成员共同崇奉的价值信仰。在红色仪式操演过程中,仪式组织人员会通过控制时间、空间、行为和数量等内容,确保嵌入其中的权力获得权威的合法支持。以红军阅兵仪式为例,作为展现自身形象最具震撼力的身体语言,其包含了精心设计过的权力安排,可通过展现工农红军的威武之躯、振奋人心的检阅誓词等对参与者进行身份激励、情感激励和精神激励。作为革命群体表达“身体语言”的具象化载体,阅兵仪式上的授旗颁奖仪式更能充分增强参与者的积极行为。“信仰也只有通过表达它的仪式,才能够清楚地表露出来。”^{[8]137}因此,党的理想信念能够通过“身体语言”涵养参与主体,激发其革命动力。

3. 红色景观:塑造百年大党形象的笃信氛围

仪式景观作为人们理解和认知政党的整体性隐喻,通常会以“表象”的形式介入人们的政治思维,引导政治个体形成一种关于自身是政党成员的集体意识。也就是说,仪式景观有着特定的“时空再造”功能,能使受众进入一个提前预设好的、具有神圣性的功能性场域,在这个特殊场域中,人们的情感和意义将得到充分表达,并会对政党形成强烈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认同。事实上,仪式景观是一种由凸显仪式主题

的象征符号,包括标语口号、舞美灯光、着装服饰、背景音乐和重要人物相互交织而成的“效应场”。依据文化心理学分析,这种效应场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通过促使参与者从中获得心灵体验、精神熏陶与思想感触,帮助人们体悟仪式景观想要传达出来的政治意志、价值信仰和情感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来极为重视红色景观的重要作用,着力建构了一个具有意义性的情感世界。如,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期间,陈独秀等曾筹办过一场盛大的仪式活动。据《民国日报》报道,当天游行人数达3 000余人,“为我国空前未有之盛举”。人们高举“劳动神圣”旗帜;在路口中心处设立一处讲台,学生们高唱《国际歌》,围观者千余人;有的队伍进行了精心装扮,生动地揭露了“尖帽长衫之阔人”之丑态^[9]。现场气氛对参与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极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斗争情绪。1938年3月,由中共中央支持和邓颖超发起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了妇女纪念仪式,并且举行了天津史上首次“三八”国际妇女节仪式。在整个仪式活动期间,邓颖超等对仪式流程、仪式内容和仪式环境进行了精心布置:大会活动首先由主席江韵清致开会辞,接着再由达仁女学的学生合唱《国际歌》,雄壮浑厚的旋律使在场人员深受感触;在仪式临近结束时,邓颖超在大会上大声疾呼广大女同胞务必明确斗争目标,强调“妇女欲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非妇女自身以极诚恳的极热忱的亲自参加改造社会的工作不可”^[10]。这些经过严格考究的红色标语、服饰、口号和音乐,以情感的逻辑对民族解放斗争进行了一场“想象性体验”,并通过强烈的情绪带动和情感渲染,烘托出热烈的红色气氛,使参加活动的妇女同胞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和心灵震撼。

红色景观能使参与主体和仪式主题形成共鸣,从而产生一种持续性的敬仰和崇拜之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举行了与抗战相关的仪式活动,如1939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据统计,当日有上万名青年参与活动。这次活动盛况空前,广大青年在激昂肃穆的情感氛围中,深

刻认识到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11]除了将自身打造为一个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还注重把自身塑造成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形象。如1938年11月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仪式,延安有万余名群众集合涌入会场。据《新中华报》报道,活动现场挂满了催人振奋的红色标语,四处张贴着生动诙谐且意涵深刻的漫画。随着激昂澎湃的红色曲调弥散整个会场,现场群众反响异常热烈^[12]。这次活动唤起了参与主体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情感,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信心。

二、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价值功能

作为红色基因、红色信念和红色精神的具象化表达,红色仪式承载的理想信念、价值意义和情感寄托具有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价值功能。良好的政党形象能够增强认同感、强化忠诚度和提升凝聚力,是中国共产党筑牢执政之基、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掌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注重通过刻画集体记忆、构造权力景观和拓展共情空间等方式,增强自身形象的识别力、展现力和传播力。

1. 形象识别:刻画集体记忆以增强受众的身份归属

政治权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党要想获取公权力,首要任务是界定自身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形象。也就是说,政党是众多个体之间持久的社会集合,作为一种以权力为导向的政治组织,要保持正常运行就必须保障和增强本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因此,这既要求政党制定严密有序的制度安排,也要通过蕴含共同观点的认同符号来团结追随者,这些包括象征物、语言、景观和“政治人”等具有特定解释意义的符号,能够将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客观化”,继而用一种直观或隐喻的形式表明政党的独特性。大卫·科泽指出,“组织为了吸引成员、集纳拥趸,必须具有某种呈现自我的方式,并通过神话和仪式的手段建构一种特殊

的认同。”^[12]现代政党借助某些重要的象征将自身同“他者”区别开来,这样才能在彰显自身独立性、政治生活范畴的基础上,长久地维持群体成员的身份共识、价值共识和政治共识。

政党形象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重要命题,其政治社会化水平取决于成员是否形成“政党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的确立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需要借助由政党刻写的集体记忆达成。记忆能促使主体在时间沉淀中溯及自我的体验和觉知,进而构成“身份”这一化合物。身份从根本上关涉政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13]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形象并非无本之木,其建立在内部成员和外部民众共同的“红色记忆”之上。红色记忆是以“红色”元素为象征的集体记忆,是人们对革命历史积淀形成的一种印象,因此,其能够借助红色象征使人们理解党的理想与宗旨,并在明晰红色符号与红色历史耦合关系的基础上体悟红色情感。作为一种抽象概念,红色记忆何以形塑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形象?究其实质,红色记忆的形成和唤醒离不开红色象征的隐喻功能。红色象征与其表征的政党形象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可使人们对党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形成正确认知,并“以生动的形象性触发受众个体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正向的情感”^[14]。然而,红色记忆的“易变性”决定了它并非一成不变,其所承载的红色意涵将会逐渐淡化,因此,哈布瓦赫指出,“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5]⁴⁰。为了将红色记忆及其蕴含的红色信念保存下来,这就需要发挥红色仪式的记忆刻画功能。

红色仪式能够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时空壁垒,使仪式参与者在回忆过往中铭记历史。红色仪式以生动鲜活且带有价值隐喻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者、新中国建设者、改革开放推动者和民族复兴引领者的光辉形象,并在点燃群众热烈情绪的同时引起情感上的持久共鸣。换言之,红色仪式有助于塑造和传播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党形象,从而获得党内成员的忠实支持,赢得党外民

众的好感和信任。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仪式和国民党存在显著差别:从入党宣誓仪式的流程和形式看,尽管两党都设置了挂旗、奏乐、演讲、握拳和宣誓等环节,但中国共产党悬挂的是以“镰刀”和“锤子”为主要元素的旗帜,诵唱的是《国际歌》,宣誓内容也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16]。

2. 形象展现:构造权力景观以强化党的政治动员力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逻辑决定了政党必须创设具有组织功能的象征,并由此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有效整合社会利益的“代表”形象,这一象征内隐着政党对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表征着整个共同体的政治意愿。让-马克·夸克指出,“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指挥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这种地位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1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内部成员和外部公众承认本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政党必须证明自身具有创造公共福祉的能力。基于此,在实现共同体繁荣的政治语境下,政党开始刻意训练和强化这种责任和能力,目的是构造一个服务共同体的“权力景观”。这一景观是否具有有序性和权威性,取决于其是否构建了一套规范化的政治沟通机制。所谓“政治沟通”,是指政党通过信息沟通强化成员内部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体感。依据控制论的论域分析,如果政党能够建立一套迅速、全面和准确的沟通机制,就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与政治权力有关的活动。

为了确立一种不被外界轻易“曲解”的政治形象,政党必须借助具有表达意义性的仪式行为。在互动仪式理论中,人们基于互动行为形成了一种“团结感”。这种团结感表现为“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18],其能使主体在政党活动中得到充分的情感力量。红色仪式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爱国主义能量,通过有组织的安排,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合力。如在1939年举行的“三八”妇女节仪式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19]事实表明,一套完备

有序的仪式活动,不仅有助于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送和处理,还能化解成员之间因认知能力、身份地位和价值偏好差异导致的信息曲解。如1939年9月延安举行的“九一八”八周年紀念活动就解决了部分国人主权意识淡薄的问题,在这次仪式活动上,毛泽东同志使用“沉痛”而又“含蓄”的语气,“述说了东北人民的解放就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收复东北失地和坚持抗战是不可分离的。”^[20]

红色仪式运用宏大精密的叙事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理想,能够将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理想投射至参与者的心灵之中。如在1942年7月“七七事变”五周年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就借助一系列具有价值隐喻功能的红色符号建构出了一个极具共情力、感染力的叙事系统。据《解放日报》报道,工作人员在会场中心上方悬挂着题为“加强团结,度过难关,光明就在眼前”的巨幅画像,并且引领万余民众齐唱“团结,团结,亲密团结!团结得像钢铁……合作,合作,长期合作……”的红色歌曲。在仪式高潮阶段,《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指出,全党要同“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21]这次仪式发挥了“信仰在场”和“价值呈现”的作用,作为党传递政治价值、凝聚政治价值信仰的重要载体,使得“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22]

3. 形象传播:拓展共情空间以强化党的社会化功能

政党形象良好与否既有赖于自身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和绩效,也需要通过政治仪式将与自身形象相关的象征推介出去。政治仪式和政党形象之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一方面,政治仪式中的象征元素连接了政党的实体活动和隐喻内容,能以具象化的仪式阐释抽象化的外在形象,从而使其更具传播度;另一方面,良好的政党形象推动政治仪式不断完善,继而形成良好的政党文化内循环。涂尔干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种心理状态”^{[8]11}。政党之所以会通过仪式将自身的政治意图传递给受众,是因为政治仪式能够调动民众情绪和控

制集体行为。随着政党意图在仪式主题中不断得到彰显,本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将进一步完成社会化。

红色仪式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能够通过制造情感场域、建立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功能。究其实质,就在于红色仪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能动性实践,其作为展示无产阶级政党红色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具象化表达,能够将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领导者形象投射到人民群众心中。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塑造百年大党形象的过程,就是推动自身不断社会化的动态过程。在百年风云变幻中,我们党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举行了一系列红色仪式,立体完整地展示了党的形象。

其一,在“站起来”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政党身份筹建了各类红色仪式,如通过发表宣言、召开纪念大会、举行阅兵活动和宣誓仪式等,在国人心中树起了一个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形象。如,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是为了在传递“五四精神”的过程中培育伟大斗争精神;“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象征,通过举行此类纪念活动,能够培养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深厚情感。

其二,在“富起来”的战略转折中,我们党围绕建党、建军、建国和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举行红色纪念活动,铸就了一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者形象。如,在庆祝建党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曾对党的形象进行了拓展,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现代化。历史表明,红色仪式能够将党的价值理念、宗旨主张传达到民众之中,使其内化为人民群众普遍遵循的政治秩序。

其三,随着“强起来”新征程的历史性开启,红色仪式更能够增强人们对党的高度认同感。当前,我国在各类仪式的创设上不断取得突破,从形式到内容呈现诸多新变化,但其中的“红色”基质始终没有褪色。以 2017 年 7 月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仪式为例,组织人员在现场布置了大量的党旗和军旗,引领万余名解放军指战员齐唱红色军曲,共同构造了一个气势宏大、震撼人心的红色景

观。这次仪式点燃了全军将士矢志报国的精神火炬,使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奋斗”^[23]。2021 年 7 月,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纪念仪式,这次仪式盛况空前,从内容到形式均以“红色”为主题:无论是国旗护卫队护卫的五星红旗,还是全场高唱的红色歌曲,或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集体的致献词,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等,均突出了这次仪式的红色属性。这次纪念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在仪式中融入党的百年历史、唤醒红色记忆,汇聚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力量、整合了党内的价值共识。

三、红色仪式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4]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执着于“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并试图利用话语霸权解构党的伟大事业。要打破我们在当前“主场失语”的境况,就要在优化红色仪式中掌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

1. 加强红色仪式的规范供给,铭刻肩负使命的历史形象

能否塑造和传播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历史形象,事关我国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和领导力量的有效性。作为党的力量得以彰显的具象化载体,红色仪式不仅能够运用公众可视、可听和可信的情景化方式彰显党的性质和宗旨,也能为激励广大群众自觉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有效路径。100 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实践主题发生历史性转换,红色仪式在规模性、规范性等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然而,作为一种植根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对象化”存在,红色仪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实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多元文化思潮渗透到红色仪式活动,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泛娱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红色仪式所营造的神圣氛围;另一方面,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碎片化”

“海量化”的信息数据促使人们追求“快餐化”的情感体验,如何强化仪式的受众范围和传播效应、构设契合数字时代特点的传播方式,是红色仪式在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上述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人民群众对党的形象认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25]。为传播主流价值和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必须强化红色仪式的规范性供给。

首先,增强红色仪式的制度供给,确保红色仪式在体系设计、组织人员和运筹资金上的规范化。以入党宣誓仪式为例,《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26]此外,党章还规定了宣誓时的情景、道具和互动内容,如悬挂党旗、全体起立奏(唱)《国际歌》、入党介绍人为预备党员佩戴党徽、宣誓人代表发言等。这些制度化的仪式程序和操演流程,有利于增进宣誓者身份学习、身份实践和身份适配。

其次,增强红色仪式的功能供给。红色仪式是沟通党与人民的重要桥梁,有利于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的伟大形象,这就要求发挥红色仪式沟通信息和情绪的功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核心的认同。202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陕西延安革命纪念地参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应该来看看。”^[27]从某种意义上看,上述活动是一场具有鲜明主题的红色仪式,通过彰显中国共产党人赓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优良品格,向世人传达出了一个团结有力、踔厉奋发的大党形象。

最后,强化红色仪式的样式供给。红色仪式是一种受政治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因其直接关涉政党权威和政治信任,因此在规范程序上有着特殊规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色仪式就要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康纳顿指出,“所有仪式必须在某个时候创造,其构成的细节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或在内容和意义上有所变化。”^[28]对此,要求结合时代特征,不断拓展红色仪式的类型、方式和载体,与时俱

进地丰富红色仪式的样式。具体来说,在创设红色仪式时要充分考虑受众差异,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有针对性地设计仪式内容及操演形式。当红色仪式的目标受众范围较为广泛时,需综合考虑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情感偏好等因素,精心构思仪式的情感导入过程。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一方面,部分高校过度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由此导致大学生参与红色仪式的机会较少;另一方面,红色仪式存在着样式陈旧、形式僵化的问题,无法满足青年学生多样化的精神需要。为此,需要将红色仪式融入“大思政课”,运用“剧场化”的叙事手法,对大学生进行情感能量输入,使其产生一致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2. 创新红色仪式的叙事范式,深描锐意进取的时代形象

为了传递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现代政党需要借助仪式建构一个宏大精密的叙事系统,进而通过“某种观念、某个图式,或某种姿势、某个事物的符号反映出来”^{[15]77}。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环境、主体和工具要素以及操演过程,建构一个以红色意涵为主题的叙事系统。近年来,随着红色仪式内置的叙事系统、叙事方式和叙事载体不断拓展,一个踔厉奋发的时代大党形象已然深入人心。然而,不能否认,我国红色仪式在叙事方式上依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在宏大叙事的具体方法上创新乏力。主流媒体在宣传时执着于仪式的“大场面”“高规格”,在宣传语言上存在空洞抽象、政治说教意味浓厚等不足,以至于无法充分诠释红色仪式承载的内涵,反而给受众留下了“刻板僵化”等印象。二是在叙事话语上面临着“后现代”范式的冲击。具体来说,“后现代”叙事不愿遵守既定文体、语法和修辞的宏大叙事,转而追求微观性和人性化的“小叙事”。叙事方式在政治仪式建构政党形象时起着重要作用,对红色仪式而言,只有强化其叙事方式的正面效应、化解潜在挑战,才能有效发挥其最大功用价值。

一方面,应推动红色仪式在叙事主题上的多元化发展,加强红色仪式对塑造时代大党形象的赋能。首先,在叙事视角上应注重集体叙事。红色仪式应通过“聚众”的形式回忆党的

历史,使党的群体象征变得具体可感、实在可触,以便增强个体对党员身份的归属感,激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感。其次,在叙事话语上应重视隐喻表达。隐喻表达是连接“源域”和“目标域”的桥梁,能利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指代陌生晦涩的概念。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曾大量使用了隐喻手法,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阐明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强调“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29],表明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在叙事层面上应突出典型实例。“典型”叙事有着特殊的文化特征和价值感召力,在政党形象塑造上有着重要的舆论引导功能。其实,人类大多数行为源自对“典型”的观察和模仿,在红色仪式上塑造和宣传“榜样”人物或典型团体,能使整个仪式更具鲜明性和真实性。

另一方面,创新红色仪式政治叙事的呈现方式。在数字化时代,数智传媒的飞速发展极大影响了红色仪式政治叙事的表达方式。面对这一历史契机,要及时推进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有机融合,综合利用AI、VR/AR、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仪式现场与虚拟场景的有机融合,全方位提升红色仪式的在场性、亲民性。红色仪式内置的基于特定图式、姿势或符号形成的呈现形式,有利于引导民众对我们党形成牢固的政治情感。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依赖于公众符号结构,以建立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持续的行为模式。”^[30]基于此,红色仪式能否以新颖多样、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进行政治叙事,很大程度上关涉受众能否准确、清晰地认识党所需要的时代形象,这要求必须重视红色仪式叙事机制的顶层设计,维护红色象征及其表征意义的准确性、完整性,确保其承载的价值意蕴不被遮蔽或异化。

3. 扩大红色仪式的共振场域,厚植胸怀天下的世界形象

红色仪式作为一种传播性质的政治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塑造、阐释和传播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有着对外交往和设定世界议题的属性和倾向。红色仪式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圆融性,

以及在实践上是否具有指向力,决定了其能否向外准确地传达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声音和方案^[31]。然而,红色仪式作为革命建设年代形成的意识形态载体,其所蕴含的革命叙事逻辑与斗争精神内核,在跨文化语境中面临着严峻的阐释困境。受霸权思维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长期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长期受制于“革命范式”的认知锚定效应,这种刻板化的认知定势导致党的治理现代化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等重要成果,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注重将自身发展与人类事业联系在一起,重视通过红色仪式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贯通起来。红色仪式镌刻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的历史印记,能够通过建构具有共享性的场域空间唤醒特定情感,向外界展现一个倡导人类命运与共的世界大党形象。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借助红色仪式传播自身的国际形象,以便更好地扩大各国交往共识。如,我们党在成立100周年之际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其目的是促进各国政党交流与互鉴,共同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带来的巨大挑战。据主流媒体报道,此次峰会在海报、会场和报告上进行了精心构思,力求在突出审美力、感染力的同时突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质;在概念初创阶段,设计团队立足“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这一主题,聚焦凝聚价值共识、增进本国民生福祉等核心内容,力求烘托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强烈氛围。在概念阐释阶段,设计团队以红色元素为主基调,彰显建党百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如,在组成峰会LOGO的众多元素中,党的英文简称“CPC”被标为大红色,且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在“CPC”符号的上方,横亘着一条通往远方的红色曲线,该设计隐喻着中国共产党必将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另外,在主题海报中同样充满了红色元素,无论是橘红色的底版涂层,还是以玉坠形式缀于“中国结”底部的红色党徽,均能使参与者感受我们党谋求合作共赢的意志与决心。

系统建构红色仪式操演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转译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塑造世界大党形象

的重要路径。首先,要在不改变红色仪式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剔除某些可能会激化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偏见的仪式元素。依据桑德克提出的“晕轮效应”分析,受众群体会因红色仪式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自动屏蔽对红色仪式内蕴的世界价值的认知。由于意识形态是影响政党国际形象认同的关键因素,因此这有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其次,为红色仪式构建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利益表达机制,探寻符合各国广泛参与和共享的价值目标。有学者认为,“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32]一个政党的国际形象能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与国、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核心利益决定的。最后,密切把握国际传播发展的新态势,打造红色仪式传播的海外平台。费孝通指出,“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33]。为了让国际公众亲近与认同红色仪式所承载的文明型政党形象,就需要在尊重“他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好当地传播平台。唯其如此,才能更加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大党形象。总之,加强红色仪式对外传播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世界形象对外传播的综合效能。

参考文献:

[1] 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M]. 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9.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五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马敏:政治象征[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

[7] 《邓发纪念文集》编辑部编. 邓发纪念文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76.

[8]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 劳动节广州大巡游[N]. 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年五月十日(第二张).

[10] 天津之国际妇女节[N]. 妇女周报,十周年三月十五日(第六版).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7.

[12] 延安万余民众举行大会 庆祝十月革命及中共六中全会[N]. 新中华报,1938-11-10(03).

[13]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7.

[14] 黄煌华. 红色记忆的赓续逻辑:唤起、建构与刻写[J]. 思想理论教育,2022(4):78-83.

[15]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6] 王建华.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考证[J]. 中共党史研究,2010(8):119-120.

[17] 让-马克·夸克. 合法性与政治[M]. 佟心平,王远飞,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7.

[18]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1.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0.

[20] 秋风萧瑟夜寒袭人中 本市沉痛纪念“九一八”坚持抗战到底打回东北去! [N]. 新中华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五期(第三版).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5.

[22] 维克多·特纳. 象征之林:恩登希人仪式散论[M]. 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3.

[2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 年 8 月 1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24]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8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25]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9.

[26]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 [27]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9(01).

[28]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5.

[2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2:13-14.

[30]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3.
- [31] 高福进,孙冲亚.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论”的主要意涵及其构建路径[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6):82-92.

[32] 斯坦利·霍夫曼.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M]. 林伟成,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94.

[33]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d Ceremony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Major Party / SUN Chongya¹, GAO Fuj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How Red Ceremonies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jor Party Sun Chongya and Gao Fujin wrote in the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ue 1, 2026, that as a political act carrying the red genes and the spirit of the Party, the red ceremony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jor party: “Red symbol” as a metaphorical carrier, sketches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s a “revolutionary builder” with concrete red elements, and gathers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and fighting spirit; “Red language” as a narrative tool, deeply describes the Party’s spiritual outlook through textual and performative schemas, and conveys the Party’s value concepts; “Red landscape” as a carrier for creating a trusting atmosphere, presupposes a sacred functional field, prompts participants to form an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the theme of the ceremony, and strengthen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The red ceremony has multiple value functions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jor party and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undation: at the “image recognition” level, it enhances the audience’s sense of identity by depic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red; at the “image presentation” level, it constructs a power landscape serving the community, improves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s the Party’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power; at the “image dissemination” level, it expands the space for emotional empathy, promotes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y, and presents the Party’s glorious imag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a three-dimensional manner. In the new era, to shape and disseminate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jor par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front the impact of diverse cultural trends, 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field, and to grasp the leadership of image construction by optimizing the red ceremony: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ed supply of red ceremonies, exert efforts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function, and style, and engrave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the Party shouldering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paradigm of red ceremonies,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narrative themes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deeply describe the Party’s image of forging ahead in the new era;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resonance field of red ceremonies, build a trans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creat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platforms, and cultivate the Party’s image of caring for the world, making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jor party in the new era more distinct, vivid, and lively, taking root in the country and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CPC; red ceremony; century-old Party; party image; political sentiment; political identity